

生态马克思主义视域下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审视

古力尼革尔·吾买尔江

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830013；

摘要：生态马克思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生态问题结合的重要思想流派，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本质。生态马克思主义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置于社会生产关系框架中考察，指出资本主义的逐利性与无限扩张性是生态危机的根源，主张通过构建生态社会主义，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双重和解。

关键词：生态；自然；和谐；双重和解

DOI：10.64216/3080-1494.25.04.036

引言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2023 年报告显示，过去五十年全球物质资源消耗量增 3 倍，超 60%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退化；IPCC 发出“气候危机红色警报”，不减排本世纪末全球温升将超 2.7℃，引发严重后果。澳大利亚山火、亚马逊雨林消失、太平洋垃圾带、塑料垃圾入海等生态灾难，构成威胁人类文明的系统性危机。

面对生存挑战，主流生态理论有局限：技术乐观主义回避技术沦为“生态洗白”工具风险；深层生态学陷入否定人类主体性误区；环境经济学让资本获更隐蔽生态剥削工具。生态马克思主义以批判力脱颖而出，成为破解生态难题利器。其革命性贡献在于，将生态危机诊断从“人与自然的对立”转向“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指出生态危机本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物，撕开“人类共同责任”面纱，揭示背后阶级压迫与国际剥削。在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人与自然关系重构是核心。资本逻辑使人类陷入三重异化，破除异化既需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也需构建新型文明范式的理论勇气，这是其留给 21 世纪的思想遗产。

1 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渊源：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奠基

生态马克思主义并非无源之水，其理论根基深植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之中。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未专门撰写生态学名著，但他们在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程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思想，这些思想构成了生态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的逻辑起点。

1.1 自然的“人的无机身体”：人与自然的物质统一性

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明确提出：“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1]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人与自然的物质统一性。在马克思看来，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脱离自然的人是抽象的、不存在的^[2]；同时，自然也并非外在于人的异己存在，而是作为人的生存基础和活动对象，与人的生命活动紧密相连。

这种物质统一性意味着，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物质变换关系。人通过劳动从自然界获取物质资料，维持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同时，人的代谢产物又回归自然，参与自然界的物质循环。这种物质变换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前提，一旦这种循环被打破，无论是自然的生态平衡还是人类的生存根基都将受到威胁。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也曾警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3]这一警示恰恰印证了人与自然物质统一性的辩证法则。

1.2 劳动：连接人与自然的中介

马克思将劳动视为连接人与自然的“中介”，认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在劳动过程中，人通过自身的体力和智力作用于自然，使自然发生形态变化，以满足自身的需要。劳动不仅是人的本质活动，也是人与自然进行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基本形式。

马克思强调，劳动作为中介的性质决定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形态。在合理的劳动实践中，人能够“按照美的规律”改造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然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的性质发生了异化,成为“异化劳动”。异化劳动不仅使人与自身的劳动产品相异化、与人的类本质相异化、与人相异化,更使人与自然相异化。劳动者在异化劳动中失去了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权,劳动不再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而是沦为谋生的手段,自然也随之成为被掠夺的对象,而非人所依存的有机整体。

1.3 社会制度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制约

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置于具体的社会制度框架中考察,认为社会制度是影响人与自然关系的关键变量。在资本主义制度出现之前,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类对自然的改造能力有限,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多表现为顺应与依赖。而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同时也重塑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为根本目标,这一目标驱动着资本不断扩张,对自然进行无节制的掠夺。土地作为自然的核心要素,在资本主义农业中被视为获取利润的工具,而非需要永续利用的资源,导致土壤肥力的耗尽;工人则在异化劳动中与自然相隔绝,成为资本增殖的工具。这种制度性的掠夺逻辑,使得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断裂,为生态危机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2 资本主义与生态危机: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制度批判

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逻辑,深入剖析了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态危机之间的内在关联。他们指出,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并非技术进步或人口增长,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这种矛盾通过生产、消费、全球化等多个维度展开,最终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全面异化。

2.1 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扩张性与自然的有限性矛盾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特征是无限扩张,这一特征源于资本的本性。资本的唯一目标是实现自身的增殖,“资本的本质是创造剩余价值”,而剩余价值的实现依赖于不断扩大的生产规模 and 市场需求。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必然表现为“为生产而生产”“为增长而增长”的逻辑,这种逻辑与自然生态系统的有限性形成了尖锐对立。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在《马克思的生态学》中指出,资本主义是一种“掠夺性系统”,它将自然视为“免

费的礼物”,既不考虑自然资源的再生能力,也不考虑生态系统的承载限度^[4]。例如,在能源领域,资本主义为了追求短期利润,大规模开采化石燃料,导致温室气体排放过量,全球气候变暖;在农业领域,资本主义农业依赖化肥、农药的大量使用,虽然提高了产量,却破坏了土壤生态系统,导致生物多样性减少。自然的有限性对资本的无限扩张构成了根本性制约,当这种制约达到一定程度时,生态危机便不可避免地爆发。

詹姆斯·奥康纳进一步提出了“双重矛盾”理论,认为资本主义不仅存在马克思所揭示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第一重矛盾),还存在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第二重矛盾)^[5]。生产条件包括外部自然条件(土地、水、空气等)、劳动力条件和基础设施条件,这些条件是资本积累的前提,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却不断破坏自身存在的基础。资本为了降低成本,往往将生态成本外部化,即把环境污染、资源消耗等代价转嫁给社会 and 自然,导致生产条件的恶化。当生产条件的破坏达到临界点,就会反过来阻碍资本积累,引发经济危机与生态危机的交织。

2.2 消费主义的异化:人与自然关系的符号化

资本主义不仅通过生产领域掠夺自然,还通过塑造消费主义文化,从需求端推动对自然的过度索取。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已经脱离了人的真实需要,成为一种异化的消费,这种消费进一步加剧了人与自然的对立。

让·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不再是对商品使用价值的追求,而是对符号价值的追逐。商品被赋予了身份、地位、时尚等象征意义,人们通过消费这些符号来构建自我认同。这种符号化消费是资本刻意制造的结果,资本通过广告、媒体等手段不断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创造出“虚假需求”。异化消费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扭曲。一方面,为了满足无限膨胀的消费欲望,资本必须不断扩大生产,从自然中掠夺更多的资源,排放更多的废弃物,加重了生态系统的负担;另一方面,人们在符号消费中逐渐与自然相异化,将自然视为提供商品的仓库,而非有机的生命共同体,失去了对自然的敬畏与关怀。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批判道:“资本主义的消费主义文化,使人们忘记了自己是自然的一部分,将自然仅仅视为满足私欲的工具。”

2.3 生态殖民主义:全球化背景下的生态不平等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资本主义的生态矛盾也呈现出全球化的特征,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将这种现象称为“生态殖民主义”或“生态帝国主义”,它揭示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生态资源分配和环境责任承担上的不平等关系。

阿明·萨米尔指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形成了“中心—外围”的结构,中心国家(发达国家)通过技术、资本优势控制外围国家(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外围国家则在为中心国家提供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的同时,成为生态危机的主要受害者。这种生态不平等不仅加剧了国家间的贫富差距,也使得全球性的生态问题难以得到有效解决,因为发达国家往往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逃避应承担的生态责任。

资本主义制度通过生产、消费、全球化等多个维度,构建了一个以资本增殖为核心的掠夺性体系,这一体系不断侵蚀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础,最终导致了生态危机的全面爆发。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制度批判表明,要解决生态危机,必须超越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探索新的社会发展模式。

3 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重构

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在批判资本主义生态矛盾的同时,也致力于重构人与自然的关系,他们反对将人与自然对立起来的二元论思维,强调两者之间辩证统一的有机联系。这种辩证统一关系体现在相互依存、实践中介、历史发展三个维度,构成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

3.1 相互依存:自然的先在性与人类的主体性

生态马克思主义者首先肯定自然的先在性。自然在人类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为人类提供了空气、水、土地、矿产等必需的资源,同时也为人类活动设定了客观限度。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引用马克思的观点强调:“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前提。”这种先在性意味着人类不能脱离自然而存在,必须尊重自然的客观规律,否则将受到自然的惩罚。

同时,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也承认人类的主体性。与其他生物被动适应自然不同,人类通过劳动实践主动改造自然,以满足自身的需要。这种主体性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根本特征,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詹姆斯·奥康纳指出,人类的劳动实践具有“双重

性”:一方面,它是人类获取物质资料的手段;另一方面,它也是调节人与自然关系的方式。合理的劳动实践能够促进自然的再生与优化,例如生态农业通过循环利用实现土壤肥力的恢复,而不合理的劳动实践则会破坏自然的平衡。

3.2 实践中介:劳动的“物质变换”功能与异化扬弃

马克思视劳动为连接人与自然的中介,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发展此思想,强调劳动“物质变换”的核心功能及扬弃异化劳动对重构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性。“物质变换”是马克思提出的概念,指人与自然通过劳动进行的物质等交换过程。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健康物质变换关系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标志,如传统农业施用农家肥维持土壤肥力,是可持续模式。

但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物质变换功能被异化。资本追求剩余价值,割裂人与自然物质循环,如资本主义农业用化肥破坏土壤循环,工业生产排放废弃物超出自然净化能力,形成“代谢裂隙”。

重构人与自然关系,须扬弃异化劳动,恢复劳动物质变换功能,以人的真实需要和自然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建立合理劳动制度,如生态社会主义下的合作社生产,实现人与自然物质变换平衡。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人民出版社, 2000: 198
- [2] 马克思. 资本论(第一卷)[M]. 人民出版社, 2004: 221
- [3] 恩格斯. 自然辩证法[M]. 人民出版社, 1971: 22
- [4]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马克思的生态学[M].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88
- [5] 詹姆斯·奥康纳. 自然的理由[M].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21
- [6] 让·鲍德里亚. 消费社会[M].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122
- [7]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布雷特·克拉克, 理查德·约克. 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M].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78
- [8] 王雨辰. 生态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文明[M]. 人民出版社, 2009: 46
- [9] 周德明. 20 世纪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M]. 学习出版社, 2004: 173